

傅宏星 著

吴宓评传

Wu Mi

Pingzhuan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纪念吴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吴宓评传

傅宏星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宓评传/傅宏星 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22-3764-8

I. 吴… II. 傅… III. 吴宓(1894—1978)—评传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976 号

吴宓评传

作者: 傅宏星◎

责任编辑: 龚琼芳 责任校对: 罗 艺 封面设计: 甘 英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经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440 千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5.5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吴宓先生（版画） 张水才绘

吳宓評傳

侄輩 吳漢驤敬書
九十三歲
戊午年春月永川



吳宓先生手迹

讀顧亭林詩集

1937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華作
○時盧溝橋變起已半月。

吳宓

哀時遭亂未為詩。但誦先生不世辭。多累久非卿士恥。重關一任虎狼窺。言和言戰須成算。立政立兵好奠基。回繹啟禎當日事。覆亡容易痛殘棋。
 饗^餐■鄰封難過閱。縱橫流寇尚披猖。金甌大國迎風破。天府中原資盜糧。愚詐早無文教力。精強誰論夏夷防。振衰功在百年後。明恥博文足辨香。

按：吳先生開列謂言「顧亭林之詩甚好」未及讀也。1934秋冬，黃晦閣師在北京大學講顧詩，定於十一月始在給列
 東雲：謝書云金鑄傳顧亭林詩集不列卷二冊。手及後本年1935年。吳假得黃師給印講義一份於錄講義對東云：十六日送謝書。謝
 師：至七月始發者似非。東陽謝書。謝書細錄並錄其要於書後。至五月二十日發書。遂作此二詩。謝書二九日走漢中。

序一：还原吴宓的真相

——浅识傅宏星先生《吴宓评传》

李若冰

我读《吴宓评传》，感到很振奋，很开心，用关中土话说就是很解馋。

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乡前辈，同属陕西泾阳县蒋路乡人。因我从小离家出走，对这位乡贤所知甚微。直到我长大而又喜好文学之后，才略知一二。没想到，我的家乡竟出现了吴宓这位文化名人，叫我不胜欢欣。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也即改革开放时期，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有关对吴宓的回忆文章和屡次举办吴宓学术研讨会的信息，使我更多地知道了吴宓其人，然而对他仍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是在读了傅宏星先生的《吴宓评传》之后，才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才比较全面完整地了解了吴宓的来龙去脉。

我为吴宓教授的复出感到欣慰。我之所以用“复出”这个字眼，因为他仿佛长期被中国文化史研究者遗忘了，几乎淹没了，默默无闻了几十年。尤其因为他主编的《学衡》杂志曾被鲁迅《估〈学衡〉》一文批评过，故判定他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因而打入另册，敬而远之。其实，吴宓的事功为人和人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不同，他并非坚定的保守派。正如傅先生评说：“他一方面维护旧学术，另一方面又常在学术报刊上发表评介新文化的论文。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在必要时又采取权宜之计在林语堂办的刊物上用白话发表文章。”傅先生认为“孔子之是非非天下之是非，鲁迅之是非或许亦非天下之是非”，他提出应重估《学衡》，重新评价吴宓的学术功绩，这无疑是很

有胆识很有见地的论说。

我以为，傅先生勇于全面揭示吴宓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剖析吴宓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并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对吴宓研究的一大贡献。这部评传的主要特色就在于，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中国文化史上复杂的吴宓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解析，使其真相大白于天下。作者通过细致缜密的手法，对吴宓的身世、家庭、婚姻、恋爱、抱负和个性心理进行精细研究，又通过对吴宓留学美国、教书育人、主编《学衡》、著文作诗、人格魅力和被冷落的命运等方面的宏观把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真实的吴宓，同时也使我们对吴宓进一步产生尊敬感。

吴宓教授非凡的一生，说明他是一个坦诚率真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包括他的恋爱浪漫史，即使因此遭到非议时，也依然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他具备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他创办《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又大力引介西方文化和文学。正如傅先生所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恐怕很少有编辑像吴宓这样学贯中西、放眼世界、气势恢宏的，他真正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对比研究，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使世界文化走向了中国。”他熟稔中国古典小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尤深。他懂法、意、德、俄、希腊等多国语言，也是我国翻译界的先驱。他在清华外文系执教近二十年，倡导“博雅之士”的教育思想，培养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大家，这些门生至今回忆起他们的老师，都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作为“真诚不苟”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吴宓对社会的奉献是多方面的。显然，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史，吴宓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傅宏星先生的《吴宓评传》，传评结合，以评为主，显示出一种思想敏锐、广识博学、剖析精微和敢于树立独家之言的气魄，这是这部评传的另一大特色。从评传中看出，作者占有大量吴宓的作品、年谱、日记和各种研究资料，同时又足迹遍及吴宓所生活过的西安、泾阳、北京、成都、重庆等地，获得其亲朋好友的第一手材料，在这种

浩繁而又丰富的搜罗和采访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经过细心精选，去伪存真，并梳理了各家之说，又经过认真思考，从而提出了自己异于他人的独立论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评传以事实为依托，运用材料翔实，论证有根有据，凡列举的事实均有出处，这种实事求是的有开创意义的评传方式，不只有着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对于深刻认识吴宓和还原吴宓的真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吴宓教授被误解了几十年，他的本来面目也似乎变得模糊难辨了。作者从吴宓早年的精神印记和学术历程，从吴宓的个性心理和他饱含忧患的一生，全面论述了他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实际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无疑，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评传使我们重新了解了吴宓这个文化名人，为我们打开了全面认识吴宓的钥匙。

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部长达四十多万言论述吴宓的评传，竟出自刚满三十岁的傅宏星先生之手。他开始写这部评传时的年纪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吧。岂知，他还是学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竟然对吴宓研究如此深入透彻，如此有胆有识而又如此文采斐然，令我感慨不已。自然，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未来。希望在后来学者的手中。

2000年9月于西安雍村

序二：“边缘写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序《吴宓评传》

刘 宾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吴宓先生也曾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教育家、诗人和编辑。可是，隔代之后，再来谈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在是陌生得很，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后生不知先儒，也是常事。老百姓自然不说了，即使像我辈这些从事人文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他亦属不甚了了。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回眸历史，面对百年以来聚讼纷纭的文化现象，历史似乎提供了某种契机，让人们有可能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悠悠百年，大浪淘沙，多数文化人都不免“春秋知罪两难辞”。这其中，吴宓要算一个。他不曾有过赫赫声名，却影响久远。几十年杏坛耕耘，莘莘学子，出而为今日治学的中流砥柱者，已不在少数。所以吴宓是特别的，也是典型的，他的学术成就、道德事功，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以为：无疑也同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一样，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学院派的重要方面，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继承。

他的重新“发现”，屡屡成为报章“炒作”的对象，似乎也不过最近十年间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位对社会贡献巨大，即使在私人领域依然逃不脱“怪诞”、“内心冲突剧烈”之类“苛评”的“怪人”，为什么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传记出版？是学界不需要，还是大家不愿意写？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很复杂，但我自己没有研究，不好妄测。今

年十月，当本书作者傅宏星先生拿出其历数载之功、呕心沥血撰写而成的《吴宓评传》，托人将部分书稿带给我，并约请我作序时，多少让我感到震惊。我仔仔细细看了好多遍，越来越吃惊，越来越兴奋。谁说我们新疆学人不能完成此类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课题呢？不能“预流”！？我们除了在历史考古和民族学领域有突出的成绩之外，完全还可以积极投入“重写”二十世纪学术史的浩大工程中去。我以为《吴宓评传》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作者在治学和研究的態度、作风上，也是踏实、严谨的。他首先选取了一种适合自己学术操作的角度和诠释方式，既有微观的考证，又有宏观的把握，见解独到，令人信服。尤其让我意外的是，作者既非“专业”研究人员，又远离文化中心地带，却能做出这样的成绩，真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可佩的事情！

长期以来，由于地域上远离中心城市，新疆与内地的学术交流总的来说比较单一。但是，虽然我们偏居一隅，未必不能有所作为，不能有卓越的奉献。尽管可能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多的艰辛。这也就是新疆文化人常常引以自勉的“边缘写作”现象。也许，正是远离了文化中心地带的喧嚣和时尚，才让人沉下心来冷静思考，才拥有了一种拉开距离后审视全貌的清醒，才会产生一些不为众说纷纭所困扰的独立见解。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新疆另一位学者邵纯先生所著的《赤子容闳》一书。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容闳也是一位近代以来几被历史遗忘的人物。而他的“复出”，同样是出自“边缘写作”。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就整个新疆学术研究而言，对当代最新颖或者说最具吸引力的理论、方法以及语言学等研究手段的借用，一般来讲，并没有进入实用阶段。至于内地的学术进展和新领域的开拓，人们知之甚少，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还在耽误。地域文化背景和人才的缺乏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学术交流的单向输入而不是双向交流也是一个让人担心的现象。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学术界由否定“文革”，进而反思“五四”，再到如何重新评价“五四精神”、晚清学风等等。所有的对

往昔历史的价值追问和重新探讨，其实都源于对“文革”悲剧的深刻反思。恐怕正是基于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世纪回眸，学界有识之士才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口号。令人吃惊的是，“重写”的声音最早不是出自思想家、哲学家，而是来自历史考古学界。近二十年来，随着大量先秦、秦汉简帛古籍的出土，儒家经典“倒”而复“起”，古书古史“失”而复“得”，我们这才发现：原来“科学方法”不“科学”，时髦的理论竟如此容易过时。1992年《中国文化》秋季号上，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一文，显示了一种新学术思潮的形成。他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在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中，他提出了学术史要重写。然而，学术史的重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只有认认真真把百年历史上的一个个复杂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我们“重写”的历史才可能是真实的、负责的历史。比如，时贤多喜用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梳理百年中国的学术脉络。我以为不一定完全适宜。按照史华兹（B. Schwarz）的提法，保守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而“学衡派”则主张融合中西古典主义之精华于一炉，它只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自尊，无所谓中心不中心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学衡派思想都不作具体分析，只是笼统地归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这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本书作者显然接受了这个说法，但他同时也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成熟起来的一代年轻学人那种对文化的自觉和他们开阔的视野，都让人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今天，当整个学界都在豪迈地宣称要“重写”文学史、思想史、

学术史的时候，偏居西陲一隅的新疆学人到底能够为此贡献多少有益的见解呢？面对新世纪的到来，理当多多提倡这种个性化的研究及扎扎实实的治学态度，为了新疆学术研究的发展，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就是我在读傅宏星的《吴宓评传》后引发出的一点感想。请大家批评。

2000年12月24日于乌鲁木齐鲤鱼山下

前 言 孤怀卓犖殉道真

孤怀卓犖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一

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特富魅力的历史人物。

吴宓的“文化神州系一身”的儒者情怀，奇特的志节，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浓郁的诗人气质与名士作风，加上一段至真至诚的恋爱浪漫史，毁誉不一的声名，使得他漫长、丰富而又坎坷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卓然独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

有人说，他是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他赞美文言文，瞧不起新生的白话文学，凡是胡适之先生赞成的，他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可吴宓还反对鲁迅，是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死对头”。果真如此，那么，在这个人皆以被鲁迅骂过为荣的今日学界，真倒成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时髦事儿。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该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两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之一。在野鸡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点儿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根本用不着多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

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所以有好事者干脆断言：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生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显然又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至于吴宓的梗直，也有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哪能这番褻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岂不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关于吴宓的故事，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流传下来的确实有不少。我一向怀疑，这些今日的笑话，全是当年的小报记者添油加醋出来的。可令人奇怪的是，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人们，不是某些市井小人闲人，也不是今日“追星”的少男少女，而多是他的学生和晚辈。多少年来，大家口头上十分过瘾地传讲着吴宓的旧闻轶事，半真半假，亦庄亦谐，对他们来说，这些故事都是非常亲切的，可以以心交心的，只要符合老师一贯的作风，谁也不会当真去管它是不是确有其事，不过有一点肯定是真的：那就是他的弟子和朋友始终对他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怀念之情，一份亲切的回忆。这些回忆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回忆的毕竟是同一个人——他们敬爱的吴雨僧先生。

二

吴宓，原名玉衡、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1910年毕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次年考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当时美国最负盛名

的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1921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随即回国。1922 年创办《学衡》杂志, 前后共十一年; 1928 年至 1934 年他还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1935 年出版《吴宓诗集》。新中国成立前他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教授; 并在燕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大学、重庆大学短期讲学。其中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长达十九年, 三次出任清华外文系代理系主任, 制定了所谓“博雅之士”的培养方案, 一度又曾主持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 1949 年以后为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先生晚景凄凉, 在屡遭折磨后, 于 1978 年 1 月 17 日在家乡辞世, 享年八十四岁。

当年吴宓编辑他的自传体诗集《吴宓诗集》时, 确曾寄厚望于此书, 一门心思希冀它的问世能使别人对他有所了解。书出之后, 却颇遭怨谤, 销路并不好, 恐怕现在的图书馆里已很难找到此书了。

他胸中磊落, 绝无曲学阿世之习。为了力求忠实全面, 他把幼年不成熟的作品和别人恶意讥刺他的打油诗通通收入集中, 包括写给女友海伦的情诗, 也坦白无隐, 因而把全书弄得驳杂不纯, 好像是开杂货铺子。他还在《大公报》上自撰广告说: “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 无价值, 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 身世经历及思想情感之变迁均具于诗中……所在之诗极少删汰, 亦未修改。”试问: 世间有这样做广告的吗?!

他与那位女友, 相识十余年, 因同情而生爱恋, 但始终保持 platonic love 的关系。这件事曾受到他的挚友白屋诗人的强烈抗议, 而老夫子竟处之泰然。一天, 那女友突然拍来电报, 宣布即日要与一位年纪比她大一倍的老官僚结婚。这个打击实在太, 清华园里, 顿时凄风苦雨。一连好几天他杜门谢客, 躲在“藤影荷声之馆”里撕心啮肺地赋“忏情诗”以泄悲愤。诗成之后, 刊之北平《晨报》, 可查者有“劝君切莫谈恋爱, 此事无利有百害”、“而今嫌贫随富贾, 水性杨花太薄情”云云。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 世人照旧恋爱不误。吴宓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 居然把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 从而嘲讽之。1946 年, 有人在上海偶对李先生言及此事, 李仍不无

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甚至说：“我把他写活了。”诚然，吴宓做人治学不乏“学究气”，但嘲弄老师的痛苦，李健吾其实并不了解老师。

作为总编辑，吴先生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1922年，他和东南大学里的一帮同志创办了《学衡》杂志，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与白话运动作战，尽力维护陈旧的文言。那简直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创刊之初，便遭到鲁迅先生的迎头棒喝，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写到：“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其犀利的讥斥似乎是从学术立言的，而实质上则是因为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不能容忍异于启蒙的其他声音。不过，了解吴宓的人知道他和人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不同，他并非坚定的保守派，而实际是调和论者。他一方面维护旧学术，另一方面又常在学术报刊上发表评介新文化的论文。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在必要时又采取权宜之计在林语堂办的刊物上用白话发表文章。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一般人的惊讶和同伴们的深刻不满，最终落得个“敌笑亲讥无一可”的下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鲁迅之是非几为天下之是非。“学衡派”也因此走向文化、学术的边缘。胡适被看做新文化的首倡者，备受拥戴；主编《学衡》的吴宓则被当作保守派，颇蒙斥责。甚至胡适晚年离开了大陆，其政治态度受到批判，但其文化态度则在批判中被吸收；而对吴宓的评判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强化了历史偏见。毋庸讳言，《学衡》固然有充当“反对派”的意图，但这不是杂志的惟一倾向。只是这一意图被对手捕捉到，加以放大，最终定格在历史的终极视野中，以恒定的形象遮蔽了后来者深入探究的眼光。由此可知，试图整合杂志多重倾向的吴宓不被重视，备受误解，遭人遗忘，也是势所必然。

现在离《新青年》创刊有八十多年了，中国也已“站住了”近五十年。在经历了意识形态激情泛滥和文化、学术真空之后，人们看到激烈的反传统已在激烈中渐趋疲软，也意识到吴稚晖等人扔进茅厕的